

“台海危机”的缘起、性质及其 阶段划分研究综述

郑伟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与两岸关系发展史研究领域,“台海危机”的缘起、性质界定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一直是比较热门却存在一定争议的议题。这是由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与以往学界对“台海危机”问题认识的仁智互见所共同造成的。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历次“台海危机”的缘起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在性质界定、划分依据、划分关节点等方面争论不休,这些分歧容易使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各说各话”,不易形成应有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不易使该领域的研究深化。

[关键词]“台海危机”;缘起;性质界定;划分标准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7)03-0106-07

无论是在台湾问题研究领域,或是两岸关系研究领域,20世纪后半期所发生的历次“台海危机”始终是一个较为热门且存在争议的议题。能否深入、准确地研究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国内外学界在两岸关系研究上基本共识的形成与主流思想导向。然而,国内学界在20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历次“台海危机”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如“台海危机”的缘起与性质界定(什么是“台海危机”?“台海危机”的性质如何?);如何划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段发生的历次“台海危机”(究竟发生过几次“台海危机”?历次“台海危机”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何表述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历次“台海危机”?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议极易使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两岸关系史领域研究的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困惑与误区,同时对新时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两岸学术交流活动与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一定阻碍。有关“台海危机”的缘起、性质界定及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划分问题,不仅牵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与学术专题研究领域中的历史主线、发展脉络、历史分期等基础性问题,同时也涉及了60余年两岸关系史领域内,对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总体认识与总体评价问题,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于一身。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两岸关系进程中有关“台海危机”的争议性问题,以期做一次全面、深化、有深度的再探讨,使之更具学理性与科学性。

一、“台海危机”的性质界定与学界关于“台海危机”缘起的不同观点

“台海危机”又称“台湾海峡危机”,具体而言,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台湾当局在台湾海峡范围内发生的冲突或对峙,以及由此引发的两岸关系紧张乃至国际政治、大国利益冲突的重要历史节点。两岸关系史视域下历次“台海危机”的缘起与落幕,既是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完成祖国统一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新中国在内政外交领域履行国家职能,维护民族团结的职责所在。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台海危机”的缘起既是“解放战争”

所遗留的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也是冷战大时代背景下东西方阵营对抗的直接产物。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以来,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与争夺国家法统地位的持续冲突中,催生了两岸关系史上的“第一次台海危机”,此后数十年间陆续发生的“台海危机”皆无法跳出这个政治框架与历史缘由,这即是“台海危机”的缘起与1949年后台湾问题的由来。

国内学界关于“台海危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汪敏之在1949年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台湾的前途》专题论文。作者于文中指出,台湾国民党当局了解“人民解放军尚无强大的海空军,因此可以凭籍台湾的地形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他们尤其想利用台湾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妄图依赖美帝的直接武装援助,来继续维持其反人民的政权。”^①此后,如王芸生^②、郑鹤声^③、俞学聪^④、杨奎松^⑤、王栋^⑥、徐江艳^⑦等研究者们由不同视角入手,对“台海危机”的缘起作了不同层面的剖析。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鲁伯特·艾默生(Rupert·Emerson)在1950年《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杂志上发表的《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America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一文,是国外学界首次提出“台海危机”概念的文章。艾默生指出“中共军队可能在短时期内跨过台湾海峡,发动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台湾海峡所爆发的战争危机势必影响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甚至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的安全”^⑧。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与台湾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环境中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与西方学者把研究关注点集中到了面积仅63000平方公里的台湾海峡,“台海危机”(Taiwan Strait Crisis)亦逐渐成为冷战国际史、两岸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持续性热点问题。

总体看来,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台海危机”缘起的不同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其一,“台海危机”与“朝鲜战争”关系的相关论述。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强调“朝鲜战争”是导致“台海危机”发生的重要诱因。正是由于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冲突所引发的美国全面干涉台湾海峡事务,使新中国“解放台湾”战略一再停滞,从而最终导致了海峡两岸不间断的军事冲突与两岸同胞的长期隔绝。如乔兆红在《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题》一文中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不仅导致美国直接派兵进入朝鲜,而且导致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再度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援助蒋介石,全面卷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介入中国台湾问题,与导致海峡两岸长期分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⑨台湾学者涂成吉在《克莱恩与台湾:反共理想与理性冲突之妥协》一书中认为:“韩战虽令美国对台政策丕变,但相较于对韩国防御的积极与全面,杜鲁门与艾奇逊为避免刺激中共介入韩战或在台湾海峡另生战场顾虑下,有所保留的采取了‘台海中立化’之策略。”^⑩美国学者Nancy·Bernkopf·Tucker(唐耐心)在其著作《不确定的友情: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1992》(Uncertain friendship: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一书中指出“韩战使蒋介石政府奇迹般的得救,而免于灭亡……韩战在诸多方面加剧了美国的焦虑,使美国政策过于强

① 汪敏之《论台湾的前途》,《世界知识》1949年第1期。

② 王芸生《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

③ 郑鹤声《从台湾历史说到解放台湾》,《文史哲》1955年第3期。

④ 俞学聪《介绍“今日台湾”和“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世界知识》1955年第2期。

⑤ 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⑥ 王栋《一九六二年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⑦ 徐江艳《美国学者关于三次台海危机起因的若干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⑧ Rupert·Emerson: America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Social Reach Vol. 17, Issue 1, 1950. 1, p484-496.

⑨ 乔兆红《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⑩ 涂成吉《克莱恩与台湾:反共理想与理性冲突之妥协》,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9页。

硬……由此可见,韩战揭开了亚洲的一个新纪元,揭开了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篇章。”^①赞同此观点的学者多从“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美台关系产生的重要转折入手,强调美、台共同对“台海危机”爆发的内在推动作用。

其二,“台海危机”与“解放战争”关系的相关论述。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主张“台海危机”的缘起是1946~1949年“解放战争”的延续,亦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分歧与争夺中国法统地位双重矛盾下不可调和的产物。如沈志华在《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一文中认为,“1949—1950年中共策划的进攻台湾战役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内战的延续……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②;茅家琪在《统一意识与两岸关系》一文中指出,台湾问题与“台海危机”形成的历史事实,是“由于中国内战及随后的美国干预”所共同导致^③。赞同此观点的学者大多站在“国共内战”所产生的历史问题角度,阐释“台海危机”发生的原因。

其三,“台海危机”与“国家利益决策”理论的相关论述。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台海危机”的缘起同中、美、苏3国间的国家利益、政治同盟与军事博弈直接相关。中苏关系的丕变与中方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直接导致了“台海危机”的爆发。如牛军在《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一文中认为“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同当时中美对抗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从开始为解放台湾进行动员起,就非常关注美国的政策。当时他们虽然在政治动员中称台湾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后一个据点’,但认为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大。1950年早些时候的这种判断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而根本改变,此后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同对美国的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④杨奎松也曾撰文指出“中共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对苏联的强烈不满,根本上并非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国家利益问题。换言之,毛泽东愤然于赫鲁晓夫者,最为主要的,还是赫鲁晓夫没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协助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反而与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国谋求缓和,甚至为此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⑤。戴超武在《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与亚洲的冷战》一文中认为“两次炮击金门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更加相信核武器对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的重要性,更加相信国家的实力地位对推行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⑥王伟男则在《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48—1982)》一书中,把“战略与安全方面需要”、“维护美国的‘声望’与‘道义’形象、经济与文化利益”3点,归纳为影响“台海危机”的三大基本因素,并且认为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重要性具有了更高层次的意义,这种意义要高于台湾本身所具有的地缘战略意义。”这亦是中美邦交正常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再次发生“台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⑦。台湾学者周湘华在其著作《遗忘的危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真相》中,详细分析了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的历史背景与深层原因。书中强调“中共的台海政策也是一连串理性思考,从外交试探到军事试探都是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中共为何能在台海危机中享有主导权,倒不是中共有多好的规划,是因为中共在危机中的目标是分歧而投机的;而是美国以弹性作为台海危机的最高指导原则,期待对手不做什么以求解脱困境。”^⑧

① Nancy Bernkopf Tucker(唐耐心):《不确定的友: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1992》,台湾新新文化编译小组译,台湾新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75~76页、第81页。

② 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③ 茅家琪《统一意识与两岸关系》,《台声》1998年第10期。

④ 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⑤ 杨奎松《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上),《江淮文史》2012年第6期。

⑥ 戴超武《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与亚洲的冷战》,《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⑦ 王伟男《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48—1982)》,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⑧ 周湘华《遗忘的危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真相》,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45页。

以上3种观点,不论是“朝鲜战争”缘起说、“国共内战”续写说,或是多数学者推崇的“国家利益决策”说,皆可作为对“台海危机”缘起的重要阐释。但笔者认为,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纷争与争夺中国法统地位的政治、军事博弈,才是导致“台海危机”爆发的最根本原因。纵观历史上发生的历次“台海危机”,其主题与核心问题都与此息息相关。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与冷战国际格局的破灭,使原本“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下的台湾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内外动因。从两岸关系史的走向来看,“台海危机”与台湾问题由“解放战争”衍生,“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原本较明朗的两岸统一局势出现了重大转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介入台湾问题,又使台湾问题“不由自主”地披上了一层“冷战外衣”,“台海危机”的缘起正是在“冷战时代”国际背景的影响下应运而生,又随着冷战格局的破灭而随之出现新的变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文所述的3种观点,在其阐释方法与核心立场上并无二致,它们在运用不同史料,重点论述“台海危机”缘起的同时,将历次“台海危机”的产生,视作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解决台湾问题的正义之举。在此核心观点与主流史观的推动下,学界对“台海危机”缘起的不同看法,恰好体现了史学家尊重客观历史规律的严谨治学精神,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台海危机”缘起存在的不同意见。这里,笔者十分赞同学者齐鹏飞在研究中共党史90年历史分期问题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坚持并倡导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的同时,应该允许并理解、鼓励与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有所不同甚至是独树一帜的‘保留意见’和新观点,求同存异,一起探讨。”^①当前学界对于“台海危机”缘起的几种不同意见皆具学理支撑,应当予以肯定。

二、学界关于“台海危机”历史阶段划分的争议

关于“台海危机”的历史划分,简而言之,即依照何种逻辑思维、概念定义、理论原则与划分标准,对1949年以来发生的历次“台海危机”,作符合史实的历史阶段划分。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质与两岸关系发展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点,如何定义“台海危机”,划分两岸关系史上的历次“台海危机”,成为了该研究领域仁智互见的一项重要议题。当前国内学界在“台海危机”的历史阶段划分问题上,仍存有较大分歧,这些分歧直接产生了研究者们总结出不同版本的“台海危机”划分方式,由此出现多达5种常见的“台海危机”划分方式(从“台海危机三次说”到“台海危机七次说”)。然而,不论是“台海危机三次说”、“台海危机四次说”或是“台海危机七次说”,它们之间的分歧点却大同小异,这些不同意见集中反映在1949~1950年、1961~1965年、1995~1999年爆发的三次“台海危机”上,换言之,学界关于“台海危机”历史阶段划分的整体依据,大体有两个大的类别框架:

其一,王飞、华东方^②、陈立旭^③等学者从军事斗争角度入手,将1949年以来发生在台湾海峡范围内的,两岸间发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历次军事威慑、军事演习、军事冲突,作为划分“台海危机”的主要依据。按照此种划分方式,1949年以来两岸关系史视域内,总共发生过6次“台海危机”(包含了比较具有争议性的两次“台海危机”)^④。按时间顺序排列依次为:1949年~1953年“台海危机”(金门战役、舟山战役、东山岛战斗)、1954年~1955年“台海危机”(“九三炮战”、一江山岛战斗、大陈岛战役)、1958年“台海危机”(“八二三炮战”)、1965年“台海危机”(东引海战、乌坵海战、东山海

^① 齐鹏飞《试论中共党史9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7期。

^② 王飞、华东方《回顾五次台海危机》,《舰载武器》2004年第3期。

^③ 陈立旭《建国后台湾海峡的五次军事对抗》,《党史文汇》2001年第2期。

^④ 笔者注,采取此种划分方式的学者大多赞同“五次台海危机说”,争议点多在1965年、1999年所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

战)、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在台湾海峡开展的军事演习)、1999年“台海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登陆演习)。以上6个历史时期两岸间发生的军事冲突、军事威慑、军事演习,均不同程度地导致两岸关系与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此种划分方式具有一定的学理性,其衍生出的其他划分方式皆以两岸之间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斗争作为主要划分依据。

其二,沈志华^①、杨奎松^②、牛军^③、吴心伯^④、苗伟东^⑤等学者从冷战国际史与大国政治的角度考量,将海峡两岸持续多年的政治对立与军事斗争,划入冷战国际史与中美、中苏关系史范畴,以此作为历次“台海危机”的划分依据。按照此种划分方式,1949年以来两岸关系史视域内,共发生过4次“台海危机”(包含了比较具有争议性的1961~1965年“台海危机”)。按时间顺序排列依次为:1954~1955年“台海危机”、1958~1959年“台海危机”、1961~1965年“台海危机”、1995~1996年“台海危机”。此种划分方式更加强调“台海危机”对于海峡两岸,乃至大国政治产生的双向作用力与多维度辐射。即历次“台海危机”如何作用、影响海峡两岸的“小两岸关系”(台湾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关系)、太平洋两岸“大两岸关系”(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关系)乃至“冷战时代东西方关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两大阵营关系)的发展态势,历次“台海危机”又是如何传导、作用于国际政治格局与大国关系的变动。然而,这种划分方式同样具有一定缺陷,此种划分方式的主要争议点集中在1961~1965年与1995~1999年爆发的两次“台海危机”,其衍生出的其他划分方式皆以前文所述之划分标准作为依据。

从上述两类国内学界常用的“台海危机”划分方式不难看出,学界对“台海危机”历史阶段划分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两岸爆发的中、小规模军事冲突与军事威慑,是否构成一次“台海危机”的界定标准;第二,在没有明显爆发时间点或结束点的一个特定时期内,两岸间发生的军事对峙与隔空较量,是否构成一次“台海危机”的界定标准。单纯从军事角度出发,以两岸间发生的军事冲突、军事威慑、军事较量作为划分“台海危机”的依据显然过于片面。然而,从两岸关系的各个历史阶段来看,每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则始终无法摆脱两岸之间不同程度、不同层级的军事冲突与军事对抗。无独有偶,倘若按照前文所述的第二类划分方式,以冷战国际史与大国关系变动,作为划分“台海危机”的主要依据,则有可能忽视了“台海危机”背后非冷战因素的重要作用(1995~1996、1998~1999年“台海危机”便不能规入此列)。由此可见,以上两类“台海危机”历史阶段的划分方式均有一定缺陷之处。应当看到历次“台海危机”背后所潜藏的历史规律,并以改变两岸关系重要历史走向的,两岸之间爆发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军事斗争与历史节点,作为梳理、划分历次“台海危机”的主要依据。这种界定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两岸之间曾爆发的具有一定规模或重要意义的军事冲突或军事威慑,二是这种军事冲突、军事威慑对某个特定时期内的两岸关系走向具有关键性影响。以此划分标准为依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共爆发过5次“台海危机”,按时间顺序排列依次为1949~1953年“台海危机”(开启了海峡两岸近半个世纪的长期军事对峙)、1954~1955年“台海危机”(中共“和平解放台湾”战略出台与两岸关系缓和契机的出现)、1958~1959年“台海危机”(两岸关系由缓和到再次陷入紧张)、1961~1965年“台海危机”(两岸关系由全面对抗转向隔空对峙)、1995~1999年“台海危机”(“台独势力”影响下的两岸关系由缓和到再次陷入紧张)。

① 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了苏联》,《党史博览》2005年第1期。

② 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③ 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④ 吴心伯《反应与调整:1996年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台政策》,《复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⑤ 苗伟东《浅析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三、历次“台海危机”的表述问题

当前国内外学界普遍存在两种“台海危机”的表述方式。一是按照时间顺序,以数字形式表述历次“台海危机”,如“第一次台海危机”、“第二次台海危机”、“第三次台海危机”……使用这种方式撰文表述的学者有沈志华^①、金朝晖^②、苗伟东^③、余子道^④、李璦^⑤、王帆^⑥等;二是选取“台海危机”发生的具体历史时间段,以西元纪年的方式进行表述,如前文所提及的“1954~1955年台海危机”、“1958~1959年台海危机”、“1961~1965年台海危机”等,使用这种方式撰文表述的学者有杨奎松^⑦、牛军^⑧、林冈^⑨、吴心伯^⑩、王栋^⑪等。以上两种“台海危机”的表述方式,为研究两岸关系史的学者们所广泛运用。以数字表述“台海危机”的方式直观明了,有利于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历史现象做横向比较与纵向剖析。但由于学界对“台海危机”的历史阶段划分存在的不同见解,这种表述方式容易产生歧义,易使研究者本人与读者对研究对象产生误判误解。比如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的时间问题上,有部分学者认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可追溯至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金门战役”。另有学者认为,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事件导致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这两种观点在学界都具有一定影响力,倘若某位研究者在撰文过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台海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而仅用数字方式表述,就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无独有偶,台湾中国国民党当局1961年启动“国光计划”所引发的20世纪60年代“台海危机”,在学界也曾引起过同样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以1961年台湾当局“国光计划”的出台,作为此次“台海危机”的开端,另有学者则主张将1965年发生的“东引”、“乌丘”、“东山”海战,作为此次“台海危机”开端。类似的表述争议问题在两岸关系史研究中并不少见,但在历次“台海危机”的表述方式上,“数字表述法”所呈现出的歧义性已日益突出。正是由于“数字表述法”存在的明显缺陷,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开始采用“西元纪年表述法”,来阐释“台海危机”的相关概念。“西元纪年表述法”不仅可以避免“数字表述法”所带来的歧义,亦可使对“台海危机”历史划分问题持不同见解的研究者们求同存异,在使用相关概念阐释某次“台海危机”时,不至引起读者与其他研究者的误解。由此可见,相较于“数字表述法”,“西元纪年表述法”更具逻辑严密性,更加适用于“台海危机”的相关概念表述。因此,在学界提倡并广泛运用“西元纪年表述法”取代“数字表述法”,使“台海危机”的相关研究与表述更为精确化、规范化、具体化,以期解决学界长期存在且未达成一致的“台海危机”表述问题。

① 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了苏联》,《党史博览》2005年第1期。

② 金朝晖《第一次台海危机与中共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前沿》2008年第4期《浅析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共和平解放台湾政策》,《湖南医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③ 苗伟东《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余子道《第三次台海危机:台湾的“军事反攻”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一次台海危机与美台关系中的“外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⑤ 李璦《三次“台海危机”论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4期。

⑥ 王帆《从第二次台海危机看美台军事合作困境》,《历史教学》2006年第10期。

⑦ 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⑧ 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⑨ 林冈《美国应对与防范台海危机的策略》,《台湾研究》2007年第5期。

⑩ 吴心伯《反应与调整:1996年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台政策》,《复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⑪ 王栋《一九六二年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四、小 结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学界有关“台海危机”的缘起、性质界定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在短期内或许仍无法达成共识,这是由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与以往学界对“台海危机”问题界定标准的不一致所共同造成的,但在历次“台海危机”的表述问题上,研究者们或可求同存异,以更为精确严密的“西元纪年表述法”代替“数字表述法”,统一表述,使关于台湾问题的历史研究更具规范性。就“台海危机”在两岸关系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而言,尽快促使学界形成统一、规范的“台海危机”的历史划分与表述方式势在必行。倘若从事两岸关系史领域研究的学者能够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等学科的历史分期方法,制定出较为完整、细化的两岸关系发展史划分标准,“台海危机”的历史划分问题或可得到妥善解决。唯有如此,两岸关系史领域的学术研究与相关学科建设才可更具学理性与规范性,两岸学术交流之树亦会枝叶扶疏。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福建 361005)

[责任编辑:止耳]

本 刊 启 事

本刊已入编中国知网及其电子期刊网站,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都将自动进入该电子出版物,本刊所付稿酬已包含电子出版物及网上服务的报酬,不另计酬,凡有不同意见者请特别声明。

本刊编辑部